

解放的形式



赵毅衡形式理论思想争鸣集

FORM UNBOUND:
FESTSCHRIFT ON FORMALISM OF
PROF. ZHAO YIHENG

饶广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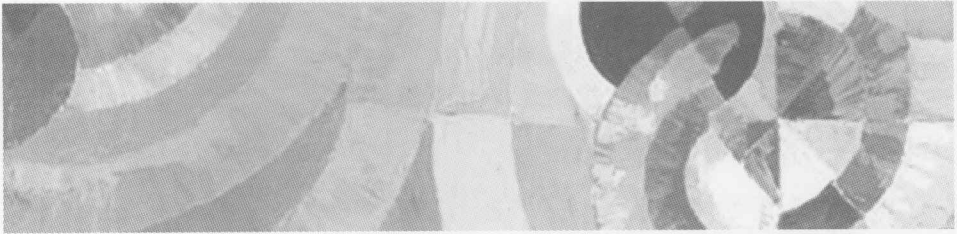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014004814

H0-53
69

解放的形式



赵毅衡形式理论思想争鸣集



饶广祥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92095

H0-53
69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程凤琴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封面辅助设计:宋 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放的形式:赵毅衡形式理论思想争鸣集 / 饶广祥
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614-6691-9

I. ①解… II. ①饶… III. ①符号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3880 号

书名 解放的形式——赵毅衡形式理论思想争鸣集

主 编	饶广祥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691-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6
字 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谨以此文集纪念在赵毅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 35 年。

In honour of Prof. Zhao Yiheng for his 35-year scholarly life.

出版前言

本书是赵毅衡教授从事学术研究 35 周年，从事大学教育 25 周年的纪念文集。先生一生专注于形式论诸学科的研究，对符号学与叙述学贡献良多，作出了一系列学科史上独创的贡献。先生对学生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奖掖创新，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对他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常说：“三人行必与我争。”也常说：“学而无派，千奇百怪。”为感谢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对后辈的循循善诱，我们找出三十多年来国内报刊上发表过的有关先生学术观点的文章，集成此书。这些文章各抒己见，并非一致赞同先生的观点，却正体现出先生之乐于接受挑战。用他自己在《符号学》一书结尾的话来说：“在挑战前认输改正，才是人生的大乐至境。”

编者将赵先生的形式研究分为 16 个领域，选出近 250 篇文章（在存目中列出），又从每个领域中选出具代表性者，构成了本书包括代序、代引言在内的 22 篇文章，其中的英文论文经过了原作者的压缩修改，部分中文文章也经过修改，可能与文章首次刊发的版本略有不同。

本书虽不足以展示先生的胸襟，但求以后辈的寸草之心，略报先生春晖之万一。赵毅衡先生的学术生涯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不尚空谈，形式理论讲究一切落到实处。先生的学术生涯让我们看到，能击中文化哲理要害的，能点中历史进程命脉的，不是玄谈，而是立足于扎实形式分析上的理论。本文集就是希望让读者、让广大学界同仁看到，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形式得到了解放：形式无边，形式的边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走向的前方。

饶广祥

2013 年 2 月 28 日，四川大学



代序

理论先锋赵毅衡：特立独行的符号学者

唐小林

当代中国文化理论正在经历深刻变局，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形式转向，其急先锋则是赵毅衡。他的符号学和符号叙述学体系，为中国和世界文论打开了新局面。

赵毅衡已然成为形式—文化论的符号。这个符号从我脑海闪过，始终与一幅画面同时出现：伯克利铺满阳光的街道，通向澄蓝的海滨，傍晚时分，雾气从海湾卷上来，沿街行道树向前推进；一个弄潮儿，从海里爬出来，开着一辆二手车，赶在翻卷的雾前面向前狂奔；雾气的前锋翻着滚着，像一群猫的鬼魂，奔跑着抓他的后轮。^① 必须声明，这不是梦境，而是赵毅衡自述的留学生活。

从《周易》对世界的符号抽象，到先秦诸子的名实之辩，再到佛学的唯识论、因明学，华夏传统不缺“形式”一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卞之琳诸公，直接受益于瑞恰慈、燕卜苏等西方形式论先驱，并在以后穆旦等“中国诗歌派”的诗里以及袁可嘉、郑敏等人的诗论中留下踪迹。现代中国文论同样有“形式论”的一支，只是在后来特定的“政治文化学”语境中断裂。直到70年代末，卞之琳先师才把这杆旗郑重地交到赵毅衡先生手里。在评价艾布拉姆斯时，赵毅衡对此就有说明：所谓新潮理论，并不是横空出世，“而

^①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是在旧有模式上翻新，在理论史的背景上前行”。^①“先锋”有时候更是“桥梁”，更是回撤后的重新出发，尤其是在巨大的历史转型时刻。进入当代中国，“形式”不意间被拉上意识形态的战车，“形式主义”成为致命大词，被当作靶子打得千疮百孔，声名狼藉。非具先锋气质与胆识的勇者，谁敢冒险接过形式论这面旗帜，并以此为终生志业？直至今日，赵毅衡还总是呼吁学界对形式论要“容忍”。

先锋，不只是一种姿态，学术贡献才是实质。赵毅衡著述颇丰，想凭仅仅几千字短文梳理其学术谱系，不仅不严肃，也不可能。在此，我仅想牵出三个话头，并不深论，唯恐犯下赵毅衡先生最不愿看到的“不专业”、“不实证”、“不精密”的学术幼稚病。这三个“话头”不是随意拾取的，而是奠定赵毅衡形式—文化论的几条最基本的原则。

一、形式无边：意义的意义

“从形式探视文化”，^②是赵毅衡形式—文化论的基本立场。而文化在赵毅衡看来，又是一个人类社会相关表意行为的集合。^③当形式成为贯穿人类一切表意活动、表意符号的总视点时，它就不仅是分析工具，而是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世界统一于形式，并以形式的方式呈现：形式无边。意义不过是形式的编织物，形式是意义的意义。

形式世界观，就是以形式观世界。这样的世界观从何得来？多年前，当我读到赵毅衡如下的自述时，我感到惊惧：“一九七八年早春，我从黑咕隆咚的煤窑里攀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令人打颤。十年的体力劳动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主导的文学方式和批评方式，所谓反映真相的现实主义，只是浅薄的自欺欺人主义。我贴近生活，贴得很近，我明白没有原生形态的、本在的生活，一切都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④这段话在别人，也许会被读成是对极权时代的控诉，在我却读出精神苦难中所熬炼出来的世界观：所谓本然的东西都是幻觉，“一切都取决于意义的组织方式”。从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再到符号叙述学，^⑤甚至对“礼教下延”和“先锋文学”的研究和批评，

①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②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③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④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

⑤ 《符号叙述学》，赵毅衡正在写作中。



35年来，赵毅衡都在为这个发现找证词，并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奥登与瑞恰慈就著有《意义的意义》。^①1930年，瑞恰慈在《清华学报》6卷1期发表的《意义之意义的意义》，标题读起来像绕口令。瑞恰慈们探究的是思与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诗学之意义的依据等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与形式攸关。赵毅衡不停留于此，在他那里，无边的形式才是意义的意义。

在形式论者多年的努力之后，我们今天再来说“文学是形式的构成物”已有些陈词滥调。^②其实，西南联大时期的冯至，在《十四行集》里以诗的方式，^③已经将这个道理说清，只是这个常识后来逐渐被人们遗忘，非要等赵毅衡们在几十年后重新讨论。即便是我们今天说“文学的意义组织方式并不停止于文本形式”，“意识形态与文化历史本身也是意义的组织方式”，^④也并不新鲜，说明形式—文化论已开始深入人心，演化为学术共识。但当赵毅衡将“形式”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超出文学文本，用于观照、分析社会、历史、文化的大局面时，所得出的结论，依然让我感到震撼：困难的形式，是文化权力采取的形式；而一旦困难的形式变得不再困难，形式出现均质化趋势，或者文类失去层次，出现合一化趋势，文化就开始面临重大危机。

由此，赵毅衡得出：“当全世界还在靠身份、血缘等统治的几千年中，中国以考查掌握文本形式的能力来赋予一部分人以文化的控制调节权力。”他进一步推论：“如果说任何社会都是分层的，那么中国以文类分层代替血缘分层，而给人以社会地位的变动权——只要掌握困难的高级文类，就上升入意义控制阶层，即士大夫阶层。如果说，现代世界多少都尽量少用血缘分层，而采用了中国式文类分层方式（如果我们把数理化经济法律等都视为文本形式），那么中国远远走在全世界之前——困难的形式，少数人弄得通的形式，也就是文化权力采取的形式。”^⑤倘若不是“形式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恐怕很难从专制的国度里，洞见考试后面“文类形式”下还存在某种“民主”，还存在这种

① 奥格登，瑞恰慈：《意义之意义》，白人立、国庆祝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4页。

③ 将这首十四行诗抄录在此：“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滴水就得到一个定形；/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还有个奔向无穷的心意，//都保留一些在这面旗上。/我们空空听过一夜的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绿衣人·伍子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④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⑤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6页。

“民主”的某种合法性。如果没有任何形式论的视角，我们甚至会把上述的文字看成奇谈怪论。不过的确，“每进必考”普遍的考试，已经成为今天社会最显性的民主特征，也是最具公信力的社会行为。

以形式观道德，赵毅衡得出：礼教下延，色情上升，道德均质化，带来的是社会伦理的普遍堕落和文化无可挽回的衰败。^①这并非是为“礼不下庶人”找说词，既有的历史摆在那里。礼教下移始于有宋一代，宋明理学推波助澜；明清至现代愈演愈烈，节妇烈女、孝子贤孙、贞节牌坊广布民间，全民道德狂热，其结果是俗文化的泛滥和精神品质的不断腐烂。“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神话，更是将道德均质化推向极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就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几乎将道德的根脉铲除，今天我们还在品尝这枚苦果。“礼不下庶人时，君子彬彬有礼；庶人尽礼时，君子以非礼骄人。”^②君子非礼，礼何存焉？

文化自有制衡之力：困难文本形式的掌控者，一有机会就想打破文化均质状态，以先锋艺术、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就会涌现。精英靠经典支撑。以形式观经典，赵毅衡又发现，一旦“经典化的操作从聚合轴摆向组合轴”，“群选经典”成为时尚，点击率成为根据，单轴化倾斜成为事实，文学场乃至文化场的破溃只是早迟，文化危机必将接踵而至。^③这样的形式观察，精辟深透，震聋发聩。近年，赵毅衡又创造性地提出文化符号学的“标出性”普遍原理，用三项关系“中项偏边”说明，“匀质化”必然导致意义方式的崩解。

当今社会文化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仍然可作形式观。譬如，程序民主才能保证结果民主，程序合法才能保证结果合法。程序不就是形式么？社会分层，权力分治，不也是形式么？“从小形式到大形式，我们就有可能从文本这窗口一窥苍茫浩荡无形无态的历史运动。”^④

二、说者被说：叙述的叙述

叙述学是形式论的重要构成。如果形式无边，是意义的意义，那么，在叙述学里，当形式遭遇主体——形式的编织者、生产者时，又当如何？形式还是意义的意义吗？形式会不会在它的生产者那里遇到边界？

为解决这个问题，赵毅衡点破了“叙述学第一公理”：“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

① 赵毅衡：《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②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8页。

③ 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④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① 这乃是“叙述的叙述”，乃是“形式无边”在叙述学里的实证。我一直认为，赵毅衡的这个发现，使他的叙述学成为“彻底的叙述学”，就连叙述主体，甚至作者都不再超然于叙述之外，它们都是叙述的产物。赵毅衡在近年致力于建立的符号叙述学体系，就是从叙述的这种自我生成入手的。

跳出文学叙述，尤其是小说叙述，在广义叙述学中，理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比如，我此刻在这里谈论的赵毅衡，不是生活中与我们一起吃饭、喝茶、聊天、谈学问，既温文尔雅、谦谦君子，又博学睿智、词锋锐利、意气风发，浑身播撒魅力的赵毅衡，而是被他编织的各种文本“叙述”出来的赵毅衡。生活中的赵毅衡，有机会我将另谈：那会引出另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

这个叙述者“自身分层自身互动”、“说者/被说者的双重人格”的原则，在赵毅衡看来“是理解绝大部分叙述学问题的钥匙——主体要靠主体意识回向自身才得以完成”。^② 在小说叙述中，小说中的人物、情节、语言等不仅被叙述者叙述出来，同时也在叙述着叙述者，建构着叙述者。叙述的过程，就是叙述者成长的过程。所以，任何一个叙述，都是关于叙述者的“成长小说”。叙述者分解于、隐身在任何一个叙述行为、叙述要素的后面，统摄并使叙述成为一个整体，使“叙述”成为“叙述”。但同时，这些叙述行为、叙述要素又把这个叙述者悄然无声地“披露”出来。关于叙述者的如此这般的考察，我戏称其为“叙述存在学”。的确，叙述者与其叙述“互生”又“互文”。

不是说者在说话，而是话在说说者；不是叙述者在叙述，而是叙述在叙述叙述者。“自然化”的文化陈规，作为具有强大惰性的“牢笼”，叙述者常常会被其绑架而不自知。某大学举行新生入学典礼，新生代表上台发言，开口即“金秋十月，金风送爽”，会场一片哗然：上千师生挤在阶梯教室里，闷热难当，早已挥汗如雨。说者虽窘，也不能全算他的错，其中也有文化陈规自动生效的责任。“苦恼的叙述者”再添一层烦恼：不经意中被文化陈规牵走，叙述的权力变为权力的叙述。

三、意不尽言：符号的符号

叙述以符号为媒介，无边形式的最后考验是符号，符号是形式论的最后疆域，也是最高领域。意义与符号关系如何，事关无边形式的“命门”。当赵毅

①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② 赵毅衡：《好一双中国眼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衡以其严密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将古老的“言意之辩”，从“言不尽意”翻转为“意不尽言”的时候，“形式无边”又被推入新的边界。

言意之辩肇端于《易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引出千古学案。古今学人大致围绕三种观点展开：言不尽意、言能尽意、得意忘言。而赵毅衡明确提出“意不尽言”。这一倒转的核心是：“意”与“言”谁是主宰。“意”主导，以内容为先；“言”主导，以形式为先。

赵毅衡曾正面阐述“意不尽言”：“《齐物论第二》有云：‘言者有言，其所言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尚有言邪？’在批评性阅读之前，文本的存在待定：文本靠批评创造意义。不需要批评的文本，不是正常的文本；不需要批判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但是意不尽言，因为言者之言‘特未定’，批评只能产生一种可能的意义。”他进一步说：“文本虽然靠批评展开，任何阐发出来的‘意’无法穷尽‘言’中潜在的意。”^①这并不是要用道家去打败儒家，这是赵毅衡一贯的符号学理在文本批评中的表达。

“意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引出了赵毅衡的整个符号理论体系。

符号学即是意义之学。符号乃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而“意义”这个最为基础的概念，则被赵毅衡定义为：“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即意义的实现。”^②如果高度简化，意义就是符号的符号。一旦进入解释，一个符号必将引出另一个符号，另一个符号还可引出别的符号，解释不停，符号不止，意义不尽，“符号表意，必然是无限衍义”，^③结果当然是“意不尽言”。

阅读至此，细心的读者一定疑窦丛生。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是符号的存在。符号必定是人的符号，形式必定是人的形式，意义必定是人的意义。当形式无边，成为意义的意义的时候，人在哪里？人无论怎样也是符号的主体，而今这个主体又在何方？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④我认为，赵毅衡建立了一个解释主体。正是这个解释主体，达成了“形式无边”与人这个“主体”的自治。在那篇文字中，我笨拙的论述，沿着赵毅衡符号学的逻辑如此展开：人类因追寻意义而存在，因表达意义而符号，并因此成为符号的动物。意义从哪里来，谁

① 赵毅衡：《意不尽言——文学的形式—文化论·题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④ 唐小林：《建立解释主体：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建构》，《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决定意义，是判断符号主体的关键。赵毅衡认为，是解释决定意义，并由此确立了解释的符号主导地位。为此赵毅衡提出了五条基本的解释原则，即意义决定人的存在和符号的存在；解释决定意义；解释决定符号和文本；任何解释都是解释；断无不可解之理。这五条原则，彻底颠覆了以往将“发送者”作为符号主体的历史；瓦解了从“发送者→符号（文本）→接收者（解释）”这个层面决定的符号化过程；扭转了符号的发送者君临一切、主宰一切，接收者则处于被动之被动地位的局面；剥夺了“言不尽意”下发送主体的“特权”，并使“言不尽意”在符号学论域中成为一个伪命题。当然，解释主体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它依然受到“形式”的制约，因为任何符号解释活动，都是解码活动。意义植入“感知”，成为符号，能够被接受、被解释，是有规则的。任一解释和意义重建，都会受到这一规则的“控制”。操纵这个规则的就是符号。这样，元语言成为建构解释主体的决定性因素，而作为文化的元语言，又是被元元语言所决定的。这个元元语言，就是“意识形态”，“它的主要任务是文化意义活动的评价体系。每个社会性评价活动，也就是意识形态支持的一个解释努力”。^①前面已经提及，“意识形态与文化历史本身也是意义的组织方式”，解释主体最终依然未能逃出“无边的形式”。

从新批评到叙述学，再到符号学，赵毅衡始终贯穿了“形式—文化论”，践行了形式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彻底”的形式论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这个文论的急先锋，是符号学者中的符号学者。

法国先锋剧作家尤奈斯库有言在先：够得上先锋的，“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②而今符号学已经成为显学，以赵毅衡形式—文化论为理论支撑，以“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为特色的符号学中国西部学派正在崛起，一大批追随者的学术实绩说明，35年前，由赵毅衡们从西南联大前辈那里接过来的形式论传统，正在同一个中国西部发扬光大并得到不断推进，形成浩荡的学术潮流，推动着当代中国文论的形式转向，“真正地改变一切”。这个理论既不是“跟着洋人说”的贩卖，也不是“关门自言语”的国粹整理，而是一个世界化的中国学问，中国化的世界学问。

由此，先锋带动了潮流。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页。

② 尤奈斯库：《论先锋派》，王忠琪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



代引言

一个符号学者的“自小说”

——赵毅衡教授学术生涯访谈录

邓 艮

赵毅衡教授：1943年出生于桂林，1968年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1981年获中国社科院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其后任职伦敦大学，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专著有《远游的诗神》（1985），《新批评》（1986），《文学符号学》（1990），《苦恼的叙述者》（1994），《当说者被说的时候》（1998），《建立一种现代禅剧》（1999），《The Uneasy Narrator》（1995），《Towards a Modern Zen Theatre》（2000），《对岸的诱惑》（2003），《符号学》（2011/2012）等。

邓艮：看过有关您的一些采访，但缺乏对您学术路径的整体性追踪。我的访谈想以您的主要著作等学术成果为线索，探视您35年来的学术研究历程。我的意思并不只是总结，任何总结无疑都会简化您的学术道路，难免被时间判定为总而非结，或非总非结。

您曾在著述中好几次谈到，把自己“从形式探视文化”这一批评立场的具体实践命名为“形式/文化学批评”。在阅读您著述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无论专著还是论文，您的形式—文化论都贯穿始终。

赵毅衡：是的，我的理论追求，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我是从事形式论研究的，文学—艺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完全是内容，形式不仅是一般认为的（具有）装饰意义、工具意义，且具有本质性意义。我不愿意夸大说是“唯



一”本质，主流的或唯一正确的途径，而是说这是有效的，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当学界大部分人依然只做内容研究时，坚持形式研究，至少有补缺之效。

儒家哲学影响下的中国文论界，一直有过于重视内容的倾向。要问为什么我本人喜欢从形式出发，这倒是个人的偏好、个人的思想方式。我并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不要求其他学者同意我这种立场，甚至我的学生也不一定要献身于形式分析。我要求的只是“容忍”二字：允许形式论作为“之一”存在。我呼吁“容忍”已有35年，现在依然在呼吁。

邓良：在《窥者之辩》的《序言》和《礼教下延之后》的《后记》中您曾这样开头：“1978年早春，我从煤窑的黑咕隆咚里攀出来，地面亮得睁不开眼，但也凉得叫人打颤。”每每读到此处，背后的信息总不免令人“打颤”、唏嘘。请问学术路径的形成究竟来自您个体的独特生存体验多一些，还是更多受惠于学院教育的习得与训练？

赵毅衡：这个就说到我个人的学术生涯。1978年之前是“文革”，“文革”害国不浅，误人不浅。现在一谈“文革”，很容易变成个人对在“文革”中受苦的倾诉，这样就狭隘了。“文革”及其前奏，耽误中国学术和教育20年，其危害之大至今难以估计。我们这一代几乎没有什么学院教育，当时的管理者看到学生在大学里，就怕自己又犯错误，我读大学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下乡种田。“文革”把知识分子当作整肃对象，“越有学问越反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耽误了20多年。

邓良：1979年您就发表过3篇关于形式的论文，您一反学界长期以来几成定律的汉语诗歌节奏由“顿”构成的“顿诗论”，提出“音组排列”论，引起较大反响。我注意到，这些论文你很早就开始思考了，落款日期是“1977年8月初稿”，也就是说，在考入社科院之前，您就着手学术研究？你们这代学者有太多异常。

赵毅衡：那时只能一个人静思默想，无书无同行。《汉语诗歌节奏结构初探》的确是我第一篇学术文章。后来西南师大陈本益的《汉语诗歌的节奏》追溯到这篇文字，我是挺感动的。不是说我的研究有多出色，只是证明我在接触西方形式论之前，已经沉思默想形式问题。汉语诗歌节奏由顿构成，这个观点是卞之琳提出的。一年后我成为卞之琳的学生，但是我认为现代汉语是“短语节奏”（phrase rhythm）。卞先生看了只是笑笑，他给我看孙大雨先生的信，孙大雨说“顿”是他首先在翻译《李尔王》（孙译《黎琊王》）时采用的，先生笑着说：“还没得到学生承认，说什么先后？”在两位老先生前，我真是有点窘。



邓艮：后来您在卞之琳先生建议下，从英美新批评开始专攻现代形式文论。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您觉得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据您自述，1979、1980 两年间，您跑遍北京各高校图书馆，“把当时能找到的形式文论书籍全部读了”，并由此对文学及文学批评得出一种全新的理解：“文学是形式的构成物，因此文学批评不是为作品内容作道德评判，而是探究意义在什么条件下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被诠释。”这样的理解，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使放到今天的语境中，我觉得依然振聋发聩。我们太习惯专注于内容批评和道德评判。

赵毅衡：卞之琳先师并不一定对形式论本身非常感兴趣，他是个对语言美感觉极其敏锐的诗人，也是个感性的批评家。他在我面前一再称自己是个“minor poet”（小诗人）。我想卞之琳成为一代宗师，就是因为他拒绝端架子做“大诗人”，写一些毫无形式感的宏大语句，这就是我后来“小聪明主义”诗歌主张的由来。卞之琳这一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跟新批评家有个人接触。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识面其实并不窄，只不过让他们研究的机会太少。卞先生发现我这个人思想偏向于规律与方法，这使他想起了瑞恰慈和燕卜苏 30 年代在中国的讲课，所以他建议我不妨就从新批评做起。对先生他们这一代来说，这是还愿，这个夙愿对他们来说是一辈子的遗憾。钱钟书在他的《管锥编》中多次引用皮尔斯和瑞恰慈，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唯一注意符号学的人。1962 年，由卞之琳牵头组织编选了《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一书，“供批判之用”。第一篇就是卞之琳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与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即技巧》，可以并称 20 世纪形式论的开山名篇。

这个开篇很早就进入中国了，那是 1934 年，叶公超率领一批北大、清华的学生办了一个刊物《学文》，介绍形式论，第一期就约请卞之琳翻译这篇艾略特文，但翻译做得最多的是曹葆华。那个年代，本来他们（已经）做得初具规模了，后因抗战宣传的要求逐渐沉寂下来，接下来连年动乱，一直没有机会再研究。实际上，中国知识界跟形式论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70 年代末，卞之琳先生把这个学术传统交给我，我感到这是一个重托，不仅来自卞之琳先生，也来自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等一代导师辈人物。那时候完全靠手写，记卡片，亏得北京各图书馆存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新批评著作，不出借，我每天坐公交去读，兴奋得忘乎所以。

邓艮：所以您下决心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到符号学，到叙述学，将现代形式文论通悉了一个遍。十年中，也即整个 80 年代，您为形式文



论写了三本书：《新批评》、《当说者被说的時候》、《文学符号学》；编了两本文集，其中《“新批评”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而《符号学文学论文集》为何要到2004年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赵毅衡：整个80年代，我在外国读书，已经以形式论为主业。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都过了一遍。《符号学文化论文集》也是80年代就编译成稿了。为什么要到十几年后才面世？出版社到了某种气候才肯出、敢出某种书，此种事没有学术道理可讲，有的知识分子竟然学术立场也如变色龙，让人叹为观止。

邓艮：您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讨论新批评，自从您的专著《新批评》问世以后，学界几无新的关于新批评的著作。这本书在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88年再版。在此书中，您将新批评置于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形式主义发展潮流中加以分析，以期看清新批评理论的过渡作用。然而您在书中说，“如果我们仅根据形式主义本身的演变说明新批评的兴衰，那就是被形式主义的形式所欺蒙了”，您认为“新批评派是一种政治上保守的形式主义”？

赵毅衡：那并不是一个贬义话，任何一种批评立场都是有文化政治意义的。并不是激进都是好的，保守并不是坏东西。新批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变成了自身的障碍，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学术界走向激进，新批评的方法连同其文化政治立场一道被边缘化了。政治保守主义是好还是不好，不能一言定评的。

邓艮：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新批评派关于文本中心的一套基本术语和批评方法已被广为接受和习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老旧的文学批评模式，《新批评》的面世无疑功不可没。前几年您对此书再作修订，以《重访新批评》为书名，200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再版。而您编选的《“新批评”文集》也在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再版。在您当年研究新批评派时，新批评在欧美已经盛极而衰，被视为过时的理论，却逐渐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受众。它何以在中国能起死回生？

赵毅衡：各个国家在具体时期，理论界的需要不同。在社会式的批评过于长久统治之后，“忽然”出现一个走向形式分析的小潮流。在当时中国，回到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激进姿态，是“新鲜事物”。在当时中国，所谓保守指的是坚持社会性立场，实际上坚持社会性立场应该算激进，坚持文本分析才应该算保守；但在中国80年代特殊的语境之下，甚至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的）文化政治立场都与西方相反。中国一直缺少认真作形式分析的传统，现在批评



界注重形势分析的越来越多了，但毕竟还不是主流方法。因此，新批评在中国不仅“起死回生”，它的命还很长，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很多人还感到新鲜有用，针对中国理论界（它）至少有个补缺作用。

邓艮：新批评的影响实在深远，如今，大学里的文学研究生写论文，《“新批评”文集》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文献。您觉得在运用新批评理论时应注意什么？

赵毅衡：新批评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反讽、张力、复义等，到现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中国学生不一定很了解，甚至很多批评家也不一定理解什么叫张力，为什么文本需要张力，现在，这些概念都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加深理解。

邓艮：“三本书”中的第二本，您说“生不逢时未能出版”。这本书就是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在《自序》中，您谈到此书并非您的博士论文，而是您在准备论文时做的读书与心得笔记，博士论文还没有动手，此书却成形了，时间是1985年的夏天。

赵毅衡：这书未能在80年代出版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谈过了。笔记比我的博士论文更系统一点，因为论文不能梳理整个学科，梳理学科在西方不需要我来做。在中国叙述学还没开场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中文版《苦恼的叙述者》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删去了中国历史跟中国小说的关系部分，那部分留在牛津大学英文版《The Uneasy Narrator》中。西方历史跟小说没有这么大的重叠关系，历史就是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希罗多德的《历史》跟荷马的史诗不相关。中国远古没有小说叙述，靠历史叙述来代替史诗叙述，代替了英雄传说，这对中国民族的影响很大。《苦恼的叙述者》的论辩集中于晚清中国小说的变化，中英文版都是各有针对性重写过的。

邓艮：说到叙述学了，您能否先简单说说叙述学与形式文论的关系？

赵毅衡：我把形式文论分成这么几个大的部分：符号学，属于这里最抽象的层次；叙述学是符号学运用于叙述，正如语言学是符号学运用于语言，但是语言学学科之独立庞大、历史久远，远远超过叙述学和符号学，因此很难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运用。叙述学本身也太庞大，所以单独成为一个学科，符号学与叙述学现在就并列了。其他应当属于形式论范畴的，包括风格学、修辞学，它们都是由符号学总其成的形式论的一部分。

邓艮：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您提出“叙述学第一公理”：“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